

# 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再探讨\*

李明欢

(厦门大学 社会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21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围绕国际移民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均明显拓展,既积累了丰富的实证资料,也为建构国际移民理论体系而孜孜探求。其基本理论大致可以区分出三种取向:强调市场导向的经济理性选择论;注重政治内涵的文明冲突论;强调全球化趋向的跨国主义论。在国际移民的未来发展中,应该特别重视三个趋向,即劳动全球化的必然性,族群冲突的可能性,以及跨国主义对于传统民族观和国家观具有的严峻挑战性。

**关键词:**国际移民理论;经济理性选择;族群;跨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0)02-0005-08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移民从迁移总量到社会影响的不断增长,西方学界围绕国际移民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均明显拓展,既积累了丰富的实证资料,亦为建构国际移民理论体系而孜孜探求。笔者以为,尽管各类论著洋洋洒洒,观点众说纷纭,但基本理论取向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强调市场导向的经济理性选择论;注重政治内涵的文明冲突论;强调全球化趋向的跨国主义论。本文拟在本人2000年所作同一主题评述的基础上,对前文未能涉及的若干重要理论热点再作评介,对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再作探讨。

## 一、市场导向与经济理性选择

市场导向决定论,或曰经济理性选择理论,是国际移民理论探讨中颇具影响力的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强调“主要是市场力量决定移民”,形成“长期主宰移民学界的正统观念”(Castles, 2004: 854)。随着国际移民潮不断高涨,对西方国家政策制定者们形成重要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一再强调,国际移民实际上听从的是市场的力量,任何违背“移民市场”的政策干预,结果都可能与执政者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Widgren & Martin, 2002)。

\* 收稿日期:2009-10-20

基金项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2009年课题“社会学理论前沿对新时期侨务工作的启示”(QBY2009048)

作者简介:李明欢,女,广东汕头人,厦门大学社会学系、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

根据联合国提供的统计数据,全球跨国移民总数已经从1990年的1.54亿增加到2008年底的2.14亿,移民人口总量创历史新高(<http://esa.un.org/migration/index.asp?panel=1>)。

由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Julian Simon 提出的“西蒙原理”(Simon Principle),可为典型例证之一。“西蒙原理”的假定是:国家将不断接受外来移民,直至移民的经济贡献趋“零”为止(Simon, 1984)。欧美政界受“西蒙原理”影响明显。以北美两个移民大国美国和加拿大为例。1978年加拿大的“移民法令”将人道同情、家庭团聚和经济贡献作为移民政策的三个基本原则,但20世纪80年代之后,则一步步在实际执行中以移民对加拿大的经济贡献作为移民政策修订的首要原则,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移民计分中提高移民所受教育和所掌握专业技能的比重,而紧缩对于人道性家庭团聚类移民的准入限制。在美国,以移民经济贡献为导向在国家移民政策修订上的表现,就是拒绝向入境移民提供公共财政支持,限制移民享受社会福利。在号称“社会福利天堂”的西欧国家,同样也越来越多地对外来移民享受本国福利进行限制(DeVoretz, 2006)。将“移民接纳”与“移民外迁”纳入国家经济需求的统筹考量之中,是当今相关国家在制定或修订国际移民政策时的基本取向。

从经济学理论出发探讨“市场力量”对于国际移民之左右,还可再区分为移民自身理性选择和移民流动的外部运作两个层面。

其一,市场力量体现在移民自身选择的经济理性中,移民是一桩“生意”(Salt & Stein, 1997),或曰是一桩“家庭的生意”(Herman, 2006),是移民个人、家庭或家族对人力投资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的结果。美国移民学者 Douglas S. Massey 和 Felipe Garcia Espana(1987:4816)曾经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对于在时间范围  $t = 0 - N$  的范围内移民选择的影响因子制定了如下模式:

$$ER(0) = \int_0^N [P_1(t) P_2(t) Y_d(t) - P_3(t) Y_0] e^{-\rho t} dt - C(0)$$

其中,  $ER(0)$  是跨国移民在迁移前预期的纯收益,  $t$  是时间变量。根据研究者的分析,迁移纯收益一共会受到七个基本因素的影响,其中,第一组的三个因素源自目的国,包括:目的国入境居留管制( $P_1$ )、在目的国的工作机会( $P_2$ )、可能收入( $Y_d$ );中间组的两个因素源自原居地,包括:留在家中受雇的可能性( $P_3$ )、可能收益( $Y_0$ );第三组因素是未来币值变动的可能性( $e$ );而最后一项则为迁移成本( $C$ )。换言之,根据作者的分析,共有七个因素会影响潜在迁移者对移民收益的计算,其中,除了目的国移民政策可能形成的限制之外,其余都取决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及影响。

其二,以牟利为目的的“移民业”(migration business)出现,既是跨境人口流动市场化运作的体现,形成后亦为流动推波助澜。当今世界主要移民接纳国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移民选择、移民准入政策,国际移民政策对于移民选择进行严格制约的结果,无一例外地出现了所谓“移民业”,通过商业性运作介入国际移民流动。移民业的主体是大大小小的中介机构,其运作链则包括政府主管官员、劳务招募机构、金融机构、律师,乃至走私集团或其他居间者。移民中介的基本功能,或为想要移民而不知如何实现迁移愿望的潜在移民出谋划策;或设法为达不到目的国准入标准却又有移民愿望的“客户”进行“包装”,使其得以“合法”迁移;或直接“突破”限制将不合要求的移民送入目的国。因为移民业完全以牟利为目的,其运作必然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他们既可能帮助移民,也可能盘剥移民。由于移民业总是从与移民目的国政府移民政策博弈中牟取经济利益,因此往往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打“擦边球”(李明欢,2008)。而且,移民业一旦出现,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就强烈希望移民活动源源不绝,从而可能使相关政府基于本国利益而围追堵截非正规移民的努力事倍功半(卡斯尔斯,2001)。

澳大利亚左翼历史学家巴里·卡尔曾经尖锐指出:全球化如同不可阻挡的“压路机”,“按照大投资家和大商人设定的逻辑向政治和经济的国际化目标驱动前进”。他认为,全球化时代国际劳动力的大规模跨国流动,通过发达国家吸引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结果很可能会以劳动者的工资和生活条件恶化为代价,鼓励奔向野蛮的国际竞争,导致北方与南方的生活条件趋同,“全球化把劳工运动100年来的成就一扫而光”(卡尔,2000:51)。市场的胜利,无论是在一国或是在跨国层面

上,都意味着许多当权者已不再把极端不平等视作一个问题,而是把它作为提高经济效率的关键(卡斯尔斯,1999)。

笔者以为,对此还需要补充的是,由于进入发达国家或高收入国家(如中东石油国家)的劳工移民习惯于和自己在原居地(多为发展中国家)既往收益水准作纵向的、历史性的比较,因而能够接受比移入国主体民族之同等劳工群体远为低廉的收入与待遇,由此,资本的超常剥削就有可能以改善了外来移民的生活状态,甚而以“扶贫减困”的“慈善”面目出现,得以“合法”运作,并为国际社会所认可。

当代以国际劳动力跨境流动而展现的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趋势,呼唤着人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关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经典论述。在当今世界,资本的力量已经获得跨国行走的自由,但发达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工人阶级,却因为本国政府将利益区隔划在本国国民与外来移民之间,故而视外来“廉价劳工”是对自身既得经济利益的“威胁”,对其多方排斥。一些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客正是利用本国工人的这一普遍心态,得以在“国家利益”之冠冕堂皇的旗号下,将经过伪装的种族歧视与狭隘的保护主义理念推销到普通民众之中。由此可见,人口的跨国流动,既受市场力量之推拉,亦不可小看政治导向的影响力。

## 二、文明冲突论与移民政治格局

在对国际移民研究有重要影响的政治理论中,当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最,可以说,无论你对这一理论赞同与否,都不能对其熟视无睹。本文不是对“文明冲突论”的全方位评述,而仅仅是从国际移民角度切入其中,略作探讨。

纵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全书,可以深刻感受到亨廷顿对当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所遭遇的强大挑战心急如焚,而活跃在西方国家的数以亿计的来自非西方国家的移民,就是发出最直接挑战的载体。

亨廷顿在该书“移民”一节开宗明义指出:“如果人口分布是天定的,那么,人口流动便是历史的发动机。”他继而指出,“人口输出可能是16-20世纪西方崛起的唯一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可是,时至20世纪末,却“出现了一个不同以往但规模更大的移民浪潮”,一个受到“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刺激所致、以“非西方人口”为主构成的浩浩荡荡的移民潮(2002:218-220)。认真思考亨廷顿的以上陈述,就不难读懂他为何对当代国际移民显现出的政治格局忧心忡忡,因为,既然“人口输出”是“崛起的唯一最重要的衡量标准”(这是迄今笔者所见到的对国际人口流动的最高政治定义),那么,大量非西方人口流动不就是“非西方崛起”的活生生的展现吗?站在西方的立场上,这自然就成为一个“全球移民危机”(亨廷顿,2002:218;Weiner,1995)。

人口的跨境流动,将原本由国境疆界阻隔开来的文化族群差异,推进到面对面的同一场域,而亨廷顿笔下的“异质文明”更依附于其迅速膨胀的人口载体,四处张扬。由此,亨廷顿给予西方国家决策者的警告是:“穆斯林给欧洲造成了直接的问题,墨西哥人则给美国造成了问题”,假如美国政府对当前的移民潮听之任之,那么,20世纪末在美国人口中还占有74%比例的欧洲裔白人,到21世纪中叶可能减少到仅为总人口的50%,而同期拉美裔人口比例将从10%激增到25%(亨廷顿,2002:225-226)。文明之间的地位将因人口格局的变化而变化,这正是亨廷顿认为“挑战来自人口”的深刻隐忧所在。

不少西方国家学者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也不同程度地将国际移民问题置于“文明冲突”的政治框架内进行评说。一些学者强调指出,当代不同民族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语言文化移民的大量流动,已经并且还将继续改变如民族、国家、主权、认同、国籍、公民权、多元文化、共同体等重

要概念的内涵,进而可能影响到因全球化而改变着的各种社会关系(Cornelius et al,1994;伊斯杜伊古,2001)。

有学者提出,以往制约国际移民的理论体系,基本按照冷战时期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逻辑设计,但是,自柏林墙倒塌、前苏联解体后,世界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制约国际移民的政治指向已经不能够再以东西方意识形态划界。如今,在涉及国际移民的国家话语中,非西方移民“奔向”西方早已不再如冷战时期那样被视为“西方的胜利”,反之,具有异文化背景的异族移民,日渐被视为潜在的甚至公开的国家安全隐患(Bhagwati,2003;Hix & Abdul Hury,2007)。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 Hoffmann 认为,外来移民大量涌入与西方国家人口相对减少,业已在西方民众当中造成恐慌,认为这是真正基于文明冲突而形成的对丧失本民族特性的担忧,是后冷战时期世界表面和平,实际上却麻烦不断、秩序混乱的时代折射(Hoffmann,2000)。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提出,他们现在不是面对明火执仗的外国军队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操不同语言、信奉异端宗教、隶属另类文明之异域移民的“侵犯”。大批异族、异文化移民的涌入,可能夺走本国公民的工作,占据土地,分享福利,甚至迫使本地人改变早就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Weiner,1995:2)。

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将“文明冲突论”再度推上理论界的风口浪尖,而亨廷顿本人也在2004年出版了又一部新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在这部再度造成广泛影响的著作中,亨廷顿以大量篇幅分析了数以千万计的以墨西哥人为主的拉美西班牙语系移民进入美国后,对美国的语言、信念、道德等核心文化形成的挑战,“美国化成了非美运动”,甚至出现了“解构美国”的趋势。他指出,当前美国民众从精英到底层劳动者都出现了国家观念淡薄的倾向。“超国家身份”成为一种时髦,“从前在国内流动的人,乡土观念趋于淡薄;现在跨国流动的人,则是国籍观念趋于淡薄。他们成为双重国籍或多重国籍的人,或是成为世界公民”。外国人称祖国为“父国”(fatherland)或“母国”(motherland),然而,在当代美国人心目中,现代国家观却只剩下“家国”(homeland),即一个“有家的地方”,正统的国家认同观在现代意识冲击下支离破碎(2005:44)。

亨廷顿在书中之凿凿:外来移民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文明体系已经造成严重威胁。他认为,虽然“从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以及保持国际地位和影响的角度看,吸纳移民会有很大好处”,但是,“要付出的代价也很高:政府服务开支增多,就业机会减少,工资降低,本国原有工人福利下降,社会两极分化”,更严重的是,将会“出现文化冲突,信任感降低,国民同一性的传统理念受到损害。移民问题可能在精英群体中间引起严重分歧,在公众中间引起反对移民的情绪,给民族主义政客提供利用之机”。因此,“在当今世界上,对社会安全的最大威胁是来自移民”(2005:150-151)。亨廷顿进而指出,更令人担忧的是,“宗教集团之间的暴力行为在世界各地蔓延”,在一些群体中,对于宗教的认同出现增强的趋势,“人们越来越关心尽管相距遥远但却信仰同一宗教的人们的命运”,甚至出现“要求按照宗教界定国家特性的强大运动”(2005:14)。

近年来从美国到欧洲的法、英、西班牙等国接连不断发生的血腥恐怖袭击或大规模骚乱事件,核心肇事者几乎都有移民或移民后裔的背景。虽然此类事件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当地国政府有失公允的公共政策必须检讨,但是,“文明冲突论”借此而被众多决策者奉为圭臬,则是显而易见的直接社会后果。而且,极右派势力借反恐行动迅速抬头,曾经被民众唾弃的极端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在“国家利益”、“爱国主义”大纛的庇护下,重新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对外来移民或强制排斥、或强迫同化的论调,重又回到国家政治话语之中。强化民族血缘纽带的国际移民政策,则无论在移出或移入国,都成为政府公开进行宣传的口号。国际移民研究因此被提升到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最高政治层面。

### 三、全球化与跨国主义

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一个系统性因素,唯有将国际移民置于全球化的大系统之内,方能准确认识其社会影响,正确评价其未来走向。著名国际移民学者卡斯尔斯在他的系列论著中一再强调指出,当代许多国家的国际移民政策一再失灵,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决策者们受民族国家建构之理论框架的制约,习惯于将移民看成是可以由一国政府“任意开关的水龙头”,然而,在全球化大系统中形成的移民跨国流动,决非一国政府所能任意推拉终止(卡斯尔斯,1999,2001;Castles,2002,2004,2006)。

全球化决不可能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资本、商品、信息的流通必然与观念、文化乃至人的流动并行不悖。而且,如前所述,此类流动因“移民业”的介入而更加具备冲破国家边界的能量。全球化正在无情地冲击着许多民族国家的核心特色,世界已经从“地域性空间”向“流动性空间”转化(Castles,2004)。

如果说,历史上的移民往往是从A地向B地的定向流动,那么,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移民不仅既在A国也在B国,甚至可能同时还在C国和D国也有“家”。跨国社群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跨国意识已经显现,其未来发展有可能突破国家的政治控制,形成相对独立的“跨国社会空间”(Faist,1999;Golding,1999)。英国社会学教授Mike Featherstone论证,这是相对独立于民族国家控制之外的“第三种文化”,当跨国移民社群面对跨文化交流困境时,当他们因需要必须、而且可能在不同文化之间往返穿行时,既不同于移出地、也不同于居住地的第三种文化就可能应运而生。第三种文化以经济全球化进程为依托,超越当今民族国家业已百孔千疮的政治边界,是一种弹性的、以个体认同及调控取向为特征的新的文化(Featherstone,1990)。与此相应,美国华裔学者王爱华等以遍布全球的华侨人家网络与人际“关系”为例,论证了移民社群业已形成了“悬空的帝国”(Ungrounded Empires)。此类“帝国”的共同特点是:它们是移民的流动性与当代开放性的弹性资本主义相契合的产物,以去地域化和灵活多变为特征,其内在结构既包括实体的或虚拟的跨国公司、传媒商务,也包括通过劳务合约或其他方式跨国流动的大量移民,所有这一切跨国活动都超越了既定边界,犹如驰骋于没有国界、时区的“太空”(Ong & Nornini,1997)。

今天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大规模迁移,无论是出于移民者的主动选择,还是强制性的被迫行为,都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催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演化的结果。有学者尖锐指出:“迁移意味着加深资本主义现代化对经济、生态和文化的三重征服和转化,毫不留情地扼杀民族社群实践中包含的经济、生态和文化差异”,今天的大规模迁移和贫困既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产物,又体现了这种现代化的不足,因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已经无力为达到目标提供充分的工具。结果,现代化制造迁移的倾向与它防止迁移的机制之间,就出现了越来越宽的鸿沟(埃斯科巴,2004:158)。

未来社会学对全球化的研究,同样要求超越民族国家中心论的范式,以多种跨国性和全球性现象和过程为主题,把对于跨国的和全球的社会结构研究,视为全球体系中的关键变量。经济、阶级、政治过程、文化的跨国化和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发生的整合过程,是社会学研究全球化的“制高点”;而跨国性、全球性交往和网络对社会生活和形成单一全球空间意识的影响,则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梁光严,2000:11)。有学者进而提出,随着全球化时代不同经济体之间相互依存性的增强,不

---

关于“第三种文化”有不同界定,例如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形成了“第三种文化”,或曰“将传统上被称作‘科学’的东西”改变成“大众文化”的文化(布罗克曼,2003)。本文仅限于探讨与跨国移民理论相关的“第三种文化”概念。

同移民类型之间的差别缩小,对专业人士和技术工人的需求上升,移民政策制定向地区性合作转型,有可能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将所有各类移民融为一体的“国际移民体制”(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gime),此乃全球化时代国际移民的时代意义(Appleyard,2001:7)。

正是基于全球化时代跨国主义理论的影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越来越多地试图影响乃至规范各国的国际移民政策,从每年12月18日“国际移民日”的确立,到每年一度“国际移民全球论坛”的定期召开,联合国一再立足于当今时代最高国际协调机构的特殊地位,强调正确认识国际移民的历史意义。因为,迁移与人类历史并存,迁移不仅是改善个人处境的努力,同时也应是改善全人类命运的追求。在当今时代,虽然还不能要求或希望任何一个国家为了他国他人的利益而制定本国的移民政策,但是,实现移出国、移入国及移民者三方共赢,应当是所有国家应对国际移民的最高指导原则。

#### 四、问题与思考

正如著名国际移民学者Alejandro Portes所言:千万不要指望有一种宏大理论能够解释移民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层面,号称面面俱到的理论只能是空谈,没有哪一种理论可以独立提供解读国际移民的捷径。他认为,应当提倡“中程理论”,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阐释一个个特殊问题(Portes,2003)。

纵观当代西方国际移民学界有一定影响的理论模型,如推拉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主要是从人口迁移的动因建构理论模型,而移民网络、连锁因果、迁移文化及多元文化论等,则侧重于移民延续、社会融入层面的探讨(李明欢,2000)。本文重点评介的经济理性、文明冲突和跨国主义理论,其所关注的重点是国际移民的社会影响及对相关国家移民政策的绩效评估。笔者以为,理论的力量不仅在于对既往的诠释,更重要的是对未来趋势的预测。基于前述探讨,本文在此拟结合中国国情,就国际移民发展在可预见的将来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提出三点思考。

第一,劳动全球化的必然性。只要人类社会继续发展,国际移民问题就会与民族、国家共存。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国际移民人数还会继续上升,与这一最具活力的人口现象密切相关的机遇和挑战也将层出不穷。徐长福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学说理论,深刻分析了当代劳动力跨国流动的意义。他指出,资本的全球化要求劳动的全球化,这是资本完成自身逻辑的题中应有之义。资本有全球化的权利,这是一种关于物的客体性权利或力量;劳动也有全球化的权利,这是关于人的主体性权利,它是资本全球化的相应要求,更是劳动者人权进一步发展、人性进一步完善的要求。只有两者都同等地全球化了,才可能最终形成这样的理想局面:全球化了的劳动上升为目的,而全球化了的资本下降为手段,从而全球化了的人实现对全球化了的物的统治。如果劳动的全球化既有客观的必然性又合乎人性的要求,那么,人权的内容就要为劳动国家而改写,“到处工作的权利”将会与“到处贸易和投资的权利”并行不悖(徐长福,2007)。虽然如此设想在目前还是一种“理想类型”,但从长远看,则势在必行。对中国而言,如何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更为合理、合法、有效地从劳动全球化中获益,并贡献于世界的共同繁荣,当为国际移民研究的重点。

第二,不同族群冲突的可能性。跨国流动将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推拉到朝夕相处的同一生活情境中,而且,移民族群往往相对集中于某一经济领域,并因相似的生活习性而相对聚居,故而更有可能凸显其社会差异性。当经济大势向好,而外来移民或我行我素(如精英移民),或蛰伏于底层(如劳工移民)而逆来顺受时,社会矛盾一般不太突出。但是,一旦大批普通移民开始意识到要伸张自己的权力要求时,当他们及他们的后裔开始实现向上流动而被视为鸠占鹊巢时,外来移民

(包括其后裔)与主体民族之间在经济与权益上不可避免的竞争,就可能转化为民族、文化冲突并且爆发出来,倘若再加上别有用心者的挑拨,或遇到经济危机的火上浇油,或糅入极端宗教主义因素,冲突就不可避免,甚至可能激化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进入21世纪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进入并定居中国,局部矛盾时有发生,中国自身也已经面对着如何接纳外来移民,如何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外来移民和睦相处的社会问题。然而,中国迄今尚无全面完整的国际移民法律法规,相关政策也比较零散,因此,如何因应现实,迅速制定中国自己的国际移民政策,已是迫在眉睫之要务。

第三,跨国主义趋势的挑战性。财富精英从跨国运作中牟取最大利益,知识精英从跨国游走中实现个人最大价值,普通劳动者从跨国出卖劳动力中改变命运,如此种种,都是跨国主义的当代实践。以精英为主的自上而下的影响力,和以普通移民为主的自下而上的两股力量汇聚,势必从不同层面冲击传统的国家观和民族观。传统民族国家观的理论基础是所有人只能隶属于一个国家,跨国移民必须在祖籍国和移入国之间择一而从。然而,当代跨国主义理论导向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对双重或多重公民权的认可。据国外学者统计,近年来全世界已有大约半数国家承认双重国籍。以移民外迁为主的国家希望通过承认双重国籍,使其在外移民与祖籍国保持更密切的关系,使国家从中获取更大利益;而以移民接纳为主的国家则希望通过这一政策,帮助外来移民摆脱其孤立无援的处境,增进对本国社会的亲近感,进而融入本国社会。当代人口流动与信息传递的便捷高速使许多人得以跨越边界,同时生活在两个、甚至多个国家,他们跨越边界的意义可能是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或文化的,他们的活动领域是“跨国社会空间”,他们的认同隶属于“跨国主义”,这一群体因而也就被称为“跨国社群”。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跨越边界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成为其生活的必然构成,那么,势必具有冲破国家障碍的强大能量,其对当今世界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政治格局已经并且还将继续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

#### 参考文献:

- 埃斯科巴,阿图罗,2004:《迁移、发展与哥伦比亚太平洋沿海地区的现代化》,《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1期。
- 布罗克曼著,2003:《第三种文化》,吕芳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 亨廷顿著,2005:《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 亨廷顿著,2002:《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 卡尔,巴里,2000:《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下的劳工国际主义》,《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1期。
- 卡斯尔斯,斯蒂芬,1999:《全球化与移民:若干紧迫的问题》,《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2期。
- 卡斯尔斯,斯蒂芬,2001:《21世纪初的国际移民:全球性的趋势和问题》,《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3期。
- 李明欢,2000:《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
- 李明欢,2008:《谋生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在以色列的福建人》,《世界民族》第4期。
- 梁光严,2000:《全球化研究与社会学的范式转换》,《国外社会科学》第3期。
- 徐长福,2007:《论劳动的全球化:从马克思主义暨中国的视角来看》,《天津社会科学》第4期。
- 伊斯杜伊古,阿赫梅特,2001:《从土耳其的过境移民看国际移民体制的政治学》,《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3期。
- Appleyard, Reginald, 2001: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olicies 1950 - 2000",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41 (6).
- Bhagwati, 2003: "Borders beyond control", *Foreign Affairs*, Vol. 1.
- Castles, Stephen, 2002: "Migration and community form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6 (4).
- Castles, Stephen, 2004: "The factors that make and unmake migration polic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8 (3).
- Castles, Stephen, 2006: "Guestworkers in Europe: A resurrec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40 (4).
- Cornelius, Wayne A., Philip L. Martin & James F. Hollifield, 1994: *Controlling Immigr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Voretz, Don J., 2006: "Immigration policy: methods of economic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40 (4).
- Faist, Thomas, 1999: "Developing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the Turkish - German example", In Pries ed.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 Hampshire: Ashgate.
- Featherstone, Mike, 1990: "Global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7.
- Golding, Luin, 1999: "Power and status in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In Pries ed.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 Hampshire: Ashgate.
- Herman, Emma, 2006: "Migration as a family business: the role of personal networks in the mobility phas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44 (4).
- Hix, Simon & Abdul Houry, 2007: "Politics, not economic interests: determinants of migration polic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41 (1).
- Hoffmann, Stanley, 2000: *World Disorders: Troubled Peace in the Post - Cold War Er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Massey, Douglas S. & Felipe Garca Espana, 1987: "The social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cience*, Vol. 237.
- Ong, Aihwa, & Donald Nonini eds., 1997: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 Portes, Alejandro, 2003: "Conclusion: Theoretical convergenc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n the study of im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7 (3).
- Salt, John & Jeremy Stein, 1997: "Migration as a business: the case of traffick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35 (4).
- Simon, J. 1984: "Immigrants, Taxes and Welf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0 (1).
- Weiner, Myron, 1995: *Global Migration Crisis: Challenge to States and to Human Right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 Widgren, Jonas & Philip Martin, 2002: "Managing migration: the role of economic instrumen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40 (5).

[责任编辑:陈双燕]

## A Reflection on Contemporary Wester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ory

LI Ming-hu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The Western academia has made significant new progress o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or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academics have not only accumulated rich empirical data, but also made great efforts in building up 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oretical system. The primary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ational choice based on market-oriented consideration; the stress on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transnationalism going along with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With regard to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re are three trends to be highlighted i. e.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globalized labour market, the potentials of ethnic conflicts and the serious challenges towa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at stems from the further spread of transnationalism.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ory, economic rational choice, ethnic group, transnationalism